

道何以言

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

马德邻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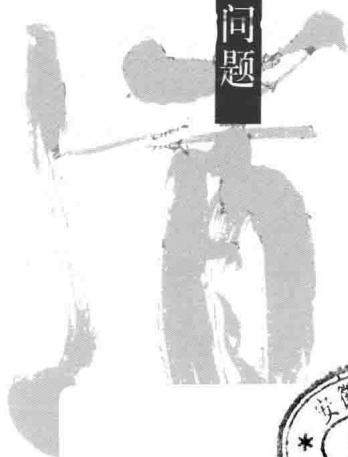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ISBN 7-309-04711-9
I · 401
定价：25.00元

道何以言

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

马德邻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何以言: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马德邻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9
ISBN 978-7-5426-4833-4

I. ①道… II. ①马…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3.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2188 号

道何以言——兼论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语言学问题

著 者 / 马德邻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6.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833-4/B · 369

定 价 / 2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序 言

中西早期哲学中的“道”和“逻格斯”皆为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而且靠着一种奇怪的巧合，“道”与“逻格斯”都具有思想和言说的二重性。在希腊语中，“逻格斯”既有理性的意思，又有言说的意思；或者说，它既意味着思想，又意味着言说。“道”既是词与内在思想借以表达的东西，也是内在思想本身。概言之，“道”和“逻格斯”都涉及思想如何表达自身的问题。就此而言，中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大致相同，只是讨论的进路、方法以及语言有所不同，由此开启了不同的哲学传统。西方哲学秉持以“有(是)”为核心的哲学形上学和主客二分的立场，而中国哲学(主要是先秦道家哲学)则坚持以“无”为核心的哲学形上学及主宾不分的立场。但是，先秦时期的名实、有无之辩、老庄关于“道”“言”的讨论、两汉的古今之争、魏晋的言意之辩等等，都是对语言学问题的关切。只是到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中国哲学则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有着阶段性的转变。然而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也是对认知(包括心理)问题的关切；清代的小学，即使在严格意义上也是对语言学(语义和语用)问题的探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在早期经典著作的语言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譬如关于《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专书的词汇、语法研究；有关先秦诸子专书的语法研究也有不少收获，如何九盈的《先秦诸子的语言观》、赵长才的《〈庄子〉语法研究》、黄珊的《〈荀子〉虚词研究》、崔立斌的《〈孟子〉词类研究》、董琨的《〈墨子〉语法研

究》等成果,可是这些都属于纯语言学研究,其目的指向理解语言的内部机制,与哲学语言学分析有所不同。哲学语言学分析指向对世界的深刻理解、涉及“思想如何表达自身”的问题。九十年代后,国内部分学者开始用西方语言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语言问题,如刘小枫、张祥龙、李儒义、朱哲、胡伟希、周光庆等,主要侧重于解释学或中西哲学语言观的差异,但是也给中国哲学形上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语言学视野。

有关中国哲学形上学与语言学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也主要是针对某个哲学流派如道家、墨家或对某个哲学家思想的探讨,如对老子、庄子有关形上思想和语言问题研究,其代表如法兰西学院的雷慕沙、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近来还有美国哲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以及海外华人学者李晨阳等。他们的研究也不乏新的研究视角和启发性。

“道”与“言”及其相互关系历来受到哲学家的重视,在对“道”、“言”的思考中,哲学家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运思方法和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从语言学视角看,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语言哲学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在某些问题上,譬如语词的语义、语用、语法,还有言说方法等方面,仍然有某些相通之处,借助西方语言哲学方法,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出发,考察字、词、句以及言说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建立一个能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平台,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同时,从语言学问题入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或许也是一条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路径,有助于进一步开掘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宝库。

基于上述认识,本课题研究尝试从语言学问题切入,因为任何哲学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即从理解语言的机制走向理解世界,或期待一种更深形态的理解生成,如利科所说:“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在中国先秦诸子哲学中,名家、墨家、道家、儒家都有许多论述指引我们去思考语言的本性。孔子对名、言的论述,虽说是从现实政治的关怀出发,但也

可以在理论层面上理解为言辞之作为达意工具的看法,更影响到后世儒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小学传统。老子发出言说能否达其道的疑问,庄子则不仅考察名实关系、有言与无言的关系,还用大量隐喻的方式来实践其语言哲学观。所有这些,不仅引发了后世有关古今、言意、义理之争,而且还构建起中国特有的语言哲学框架,展示出先秦诸子语言哲学对世界哲学理论的贡献和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借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语言学问题,以期考察并力图揭示中国哲学的本土色彩及其特质;同时将语言学问题与概念史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例如“道”和“言”既涉及语言的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哲学概念。本研究力图对两者的语言含义及其概念历史的发展都有深入探讨,即从理论上也从历史上分析了“思想如何表达自身”这一重要哲学问题。再次,是对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史论结合的考察,特别是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给出新的解释。

由此,本研究主要在下述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道”和“言”作哲学史的考察。虽然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有关“道”和“言”的哲学史考察成果,譬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の道》(载《文学》昭和六十二年八月号);寺田透的《道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年版);相良亨的《理・自然・道・天・心・传统》(ペリカン社,1989年版);台湾学者杨儒宾的《先秦道家“道”的观念的发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刘刚的《“道”观念的发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本论则侧重于对其作语源学的考察,这种考察基于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如陈汉生所言: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道家将“道”理论化,而道家的“道”的理论是语言不能表达的。这一悖论不是将道家思想归之于反理性的神秘主义,就是认为道家学说在理性上是不可理解的。这其实涉及“道”与“言”的关系问题,如果语言不能表达“道”,那就必

然要在某些方面既要归咎于“道”，也要归咎于语言。^①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思想如何表达自身”的问题。在西方，“物与词的关系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词语的最早的事情之一，而且是以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n)之关系的形态出现的。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以至于它以一个独一无二的词语道出自身。这个词就是逻格斯。这个语词同时作为表示存在的名称和表示道说的名称来说话”^②。而汉字“道”的初文之主要义项也是表示“存在”与“说”，并且此义项一直保留至今，这也就是汉字之“道”与西语“逻格斯”如此相像、对应的缘由。相对而言，以往对“言”的考察较少涉及哲学形上学，已有的主要成果大都在于语言学方面，如张三夕的《说“言”》(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沈立岩的《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邱渊的《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论则侧重于从语言学立场考察道家之“道”与“言”的关联。“道”“言”关系，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可以扩展为两个有关语言学的问题：一是语词；另一是道说。

二是对词语的考察。本研究认识到，道家哲学并未否定或者排斥语言，它只是质疑语言的功能和局限性，并试图寻找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对语词的考察其实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之一，抑或可以称之为“小学功夫”。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有如此评价：“小学本经学附庸”，其最大的贡献在于训诂。“实际上应该叫文字学。这门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研究一个字或一个字的意义；二是研究字和词的连缀用法。”为方便起见，他并为其取名为“字义学”和“字用学”。^③所以，小学，按现在的学术名称，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对语词的考察无非是考察其始源义和词汇义。在汉语中，词源学是从训诂学中独立出来的，最

① [美]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②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2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7—248页。

初就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都称作“义”。然而,词汇意义的“义”与词源意义的“义”却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王力先生说过:词(能表者)表示一个概念(所表者),因此,词和概念的关系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造成的,一个词的所表者如果变换了,也只能转化为其邻近或与原义有关的概念,这种转化,就是所谓词义的“引申”。“引申”是从本来的意义生出一个新的意义。词义的变迁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词义的扩大;二是词义的缩小;三是词义的转移。前两者保留了原义的全部与一部分,词义的转移则是原义完全和这词脱离了关系。^①所以,当我们考察古代哲学中一个词的意义(主要是说它作为概念的内容)时,应当注意它的词源义和词汇义的区别,这就要以文字学的方法和概念史的考察相结合,以避免把词汇义与词源义混淆起来,这对我们研究早期中国哲学非常重要。

借助现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词语与世界的关系或者是词语的意义问题。我们通常是从语音、语词、句法、语义等方面对汉语的词进行描述或分析。语音或音韵学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哲学文本的大致年代,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区分词义。譬如,“重”的不同音调,使其具有不同的词义,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至关重要。重言既可以理解为重复地说,也可以理解为借重他人之言说,两者含义却大相径庭。作为“重言”(zhòng)是一种“藉外论之”的言说方法,即借故事之言(寓言)、顺他人之言(卮言)、借重古人、老人之言来阐述自己的意见,是“用诗的语言讲哲理”^②。此种方法历来有之,譬如《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中的“古人有言”到《老子》提出“言有宗”,都是在言说过程中借重他人之言以加强自身言说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一个语词既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也可以因为其在句子里所充当的语法成分而有不同含义,譬

① 参阅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555页。

②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如“德”作为动词与作为名词的语义截然不同；

《尚书》中的“德”字就是从其原初作为动名词的“得”而落实到作为概念名词之“德”，类似于西方古代政治学关于“德性”的范畴。这样，它就逐渐摆脱早期宗教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涉及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尚书》里它并不具有哲学形上学的意蕴。中国古代哲学中，“德”的形上意蕴直到《老子》始得成就。

汉语语词的分类不像西语那样确定，一个字词可能拥有多种词性，也可能名词化。甚至在西语中不能被名词化的词语，如代词、方位词上下、左右、高低、前后等等，在汉语里也完全可能被名词化，成为代名词、方位名词而获得哲学形上学的意蕴。《老子》书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关于自然神论、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哲学蕴含，彰显出早期中国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

还有一些量词、形容词等也在早期中国哲学中获得过哲学蕴含。量词涉及概括命题的标志，形容词则关涉对象的属性和功能。对形容词“大”的语法分析表明形容词由于它的不同品级，以及它与词语的组合而具有不同的哲学命意。“大”字是先秦汉语中最常用的形容词，有人统计在上古十六部书（《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礼记》）中出现 6325 例，远远超出其余 18 个次常用形容词中出现最多的“善”（1997 例）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古时期，人们何以要言“大”？通过对“大”字语义、语法、语用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哲学以“大”字表现至上、至善、至美的形上意义，这在西方哲学中是绝对没有的。

上述关于词语的考察集中到一点，就是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隐含。语词用来表达概念，由此，如何表达就是我们关注的另一主题。

三是“道”如何“言”的问题，这涉及道家哲学“言”说方式及其性质的考察。本论主要考察：一是“象”言；二是“寓言”；三是“卮言”；四是“重言”；此外还有关于反讽与反语的言说方式。这五种方式其实

都可归结为“隐喻”的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这样认为，古代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的言说方式基本上可以归结为隐喻。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中，隐喻通常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它与多种修辞方法相邻，譬如假借、借代等等。隐喻不止是一个符号、一个字词、一个短句，还可能是一则寓言、一段话语、一篇短文。隐喻能够使表达那些不能用适当的言词来表达东西；能够表达那些不可说的、无法定义或命名的东西；甚至能够表达那些只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

《周易》中的“象”具有隐喻的性质。由于“易象”本身就是占筮的符号，因此占筮者就用隐喻来解释“象”，爻辞和卦辞其实都是一种隐喻。最为显见的是所谓的《庄子》“三言”：寓言、卮言、重言都是隐喻。

“寓言”，庄子所谓“藉外论之”。“藉”者，假也。郭象说：“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连叔之类，皆所借者也。”谓假托外人论说之也。但郭象之说也不尽然，“藉外”者，还有指向字面以外之意的意思，亦即借助或假托语言（字面意义）之外某种形象、或某种意象；也可以借助于某种比较，或语义转换等阐明某种意义。总之，“藉外”的包容性很大。西方将寓言归之于“隐喻”，隐喻的使用，或许是为了“刺激产生某种形象”，或许是为了“引起某种有趣的比较”，或许是为了表示“措辞方面某种漂亮的转换”等等诸如此类。按黑格尔的说法：隐喻起初被人们所需要，是为了用“感觉”（sinnlich）现象的术语去表征“精神”（geistig）现象，而前者是必要地被人们的理解所首先包含的。所以他将“寓言”称作“意象比譬”。这一界定颇合庄子中“寓言”的言说特征。庄子的寓言就是用种种我们经验中的事物或事件形成某种“意象比譬”对“道”进行隐喻地言说。

古代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中最有争议的是“卮言”。关于“卮言”的界定有多种说法，一是郭象的解释，即把“卮”当作酒器，其特点是满则倾覆，空则仰翻，非持之故。比之于言语，则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成玄英在疏《天下》时也是把“卮”当作酒器解，“卮言”则为饮酒时的谈论，所以是“无心之言”。他在疏《寓言》时又曰：“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也。”另一种说法是王叔岷在《庄子校桎》中

所言：“卮，俗作卮。……《说文》：‘卮，圜器也。圜，天体也。’朱骏声云：‘浑圆为圜，平圆为园。’然则‘卮言’即浑圆之言，不可端倪之言……卮言浑圆无际，故为‘曼衍’。”近来还有学者认为“卮言”是手举酒杯时所说的话，即祝酒辞。而另有学者过常保、侯文华则认为《庄子》的“卮言”是“优语”。“优语”实为“优谏”的策略。《庄子》文章散漫变化、恢诡谲怪而又充满谐趣的表达特征可能是对“优语”的自觉模仿。……总之，“卮言”之称，本身即是一大隐语，是庄子学派对古“优”特殊职业演说传统的借鉴，本质上是一种韬晦之方。这种解释很有意思，特别是将“卮言”释为“酒边之语”，即俳优在酒席上取悦于君王的谐语。所谓“谐语”，即谐趣无稽，包括言辞诡诞的神异故事，也有插科打诨，以及机智的论辩等等。本研究以为，庄子的“卮言”乃受“老子”“道冲”意象的影响：“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道”像一股无尽地向上涌动的水源，怎么用它都不会穷尽。这里“冲”是涌动之象；“盈”是水充盈之象；“渊”是泉眼洄水^①之象。老子以水取象，将其叠加在一起，显现出“道”的性状和不可言喻的意义，因此庄子讲“卮言日出”就是“道言”的隐喻。所以，“卮言”也可视为“隐喻”之一种。

庄子的“藉外论之”是诗性哲学常用的一种“隐喻”的方法，庄子的哲学被冯契先生称之为“诗”，隐喻地说就是庄子哲学的“道说”方法。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里把“诗”与“思”的关系称之为“近邻”关系，是“诗”与“思”的相互面对。“诗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思亦然。”“道说乃是诗与思的共同要素；而道说之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水之于鱼和空气之于鸟——道说乃以迫使我们停止谈论要素这样一种方式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因为道说不光‘承荷’着诗与思，并且提供出诗与思横贯其中的领域。”^②从这样的视角来

① 冲、盈是会意字。冲字甲骨文从水从中，会水向上涌动摇荡的样子；盈字甲骨文似一人在盆中洗浴，水充盈形；渊则是象形字，甲骨文似一潭深水形。

② 参阅[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156页。

看,无论是中国早期哲学,还是西方早期哲学,都用隐喻在言说,都带有诗性哲学的特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诗是不能分离的。

除此之外,中国早期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还盛行一种“反讽或反语”的言说方法,譬如《老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植根于他对历史的深切认识、对其生活时代虚假的社会礼俗的反感与厌倦,由此表现为对个体主观自由的认同和追求、对个人道德的重视和强调。这种反思在语言层面上被赋予“正言若反”(反语)的特征,有些类似苏格拉底开启的反讽传统。此外,反讽的模式也是基于形上问题的特征,即以一般词语无法表达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又不能不说,不得不说,说不可说,就是一种极大的反讽。

简而言之,本论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道”何以言。其涉及的两个语言学问题则是“词的隐含”和“隐喻地言说”。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道”的早期哲学史考察	1
第一节 “道”的语源 / 1	
第二节 儒墨之“道” / 6	
第三节 老庄之“道” / 9	
第四节 《管子》四篇之“道” / 19	
第二章 “言”的早期哲学史考察	23
第一节 “言”的语源 / 23	
第二节 儒墨之“言” / 27	
第三节 老庄之“言” / 32	
第四节 《管子》四篇之“言” / 40	
第三章 语词“上”的意义	43
第一节 语词的描述性意义 / 43	
第二节 语词的价值意义 / 48	
第三节 词语的其他功能性意义 / 52	
第四章 《尚书》“德”之蕴含	57
第一节 “德”之字源 / 57	

第二节 “德”之引申：德政与教化 / 61

第三节 “德”之政治伦理蕴涵 / 65

第五章 形容词“大”的语法 70

第一节 “大”的词性 / 70

第二节 “大”的语用 / 75

第三节 “大”的语法 / 79

第六章 “象”言 84

第一节 何谓“象”? / 84

第二节 “象”何以言 / 89

第三节 “象”言何以可能 / 94

第七章 寓言 99

第一节 何谓寓言 / 99

第二节 何以“寓言” / 104

第三节 “寓言”何以言 / 109

第八章 卮言 113

第一节 何谓卮言 / 113

第二节 “卮言”何以言 / 117

第三节 何以“卮言” / 120

第九章 重言 124

第一节 何谓“重言” / 124

第二节 “重言”何以言 / 128

第三节 何以“重言” / 134

第十章 反讽与反语	138
第一节 反讽的立场 / 138	
第二节 反讽的价值取向 / 141	
第三节 反语 / 145	
第四节 反讽与“无” / 148	
第十一章 简短的结语	152
附录 论两种有关语言的哲学思想	157
参考与引用文献	174
后记	179

第一章

“道”的早期哲学史考察

中国古代哲学中同时具有“思想”和“言说”二重意义的词当推“道”字，“道”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相缠绕性，赋予其最深刻的语言哲学意义。本章将对“道”字就上述两重意义的发生与发展作一概略的考察。

第一节 “道”的语源

从字源上考察“道”，有许多学者都做过这一工作，如唐君毅、庞朴等，也有许多精深的学术见解。甲骨文中无“道”字，最早始见于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约有四种构型方式，一是由“行”与“首”构成：见于《貉子卣》；第二类由“行”、“首”、“止”构成：见《散盘》；第三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铭文中的“道”字，由“行”“首”和“手”构成：见《曾伯簠》；第四类由“行”“手”和“止”构成：见《侯马盟书》。

“行”的甲骨文字像十字路口形，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解释为：“象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金文“行”字同甲骨文。《说文·行部》的解释有所扩展，但基本义是“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有行走、出行和做、进行之义。因此它的词性应该是表动作的动词。而“首”乃象形字。甲骨文像人头有发形，突出了眼睛。金文稍变。本义指

头。因此，“道”由“行”与“首”构成，表人在行走、人在做或人在进行某事。同时“行”字所代表的也不是一般的道路，而是和巫术活动或祭祀有关的重要场所。由此有一种解释认为：“道”的原始含义是初民在集合地娱神敬神的巫术活动的记录。^①

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行的，因为（一）“行”与走步有关：“行，道也”；“堂上谓之行”（《尔雅·释宫第五》）。（二）“行”在古语中也和“言”同义，《尔雅·释诂第一》：“行，言也。”而“首”与“始”同：“首，始也”。（《尔雅·释诂第一》）这样，“道”之第一、第二类组字方式有两种解释，一是开始堂上之慢步行走或从开始走到结束；另一为开始说或从开始说到结束；两种解释或两种解释的结合都符合原始巫术活动的特征。古时宗教祭祀活动的地方也是公众集会、说话、交往的场合。所谓“道场”，说、唱之场合也。巫术亦是经由巫师之口说出神的旨意。

巫起源于何时，无从断定，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的，古已有之的存在。”^②据陈来先生考证，中国的“巫”之存在不晚于五帝时期。就文明时代而言，文献记载夏代已有与巫相关的行为。古巫的主要活动是以神灵观念为基础，以舞降神，谄媚和取悦神灵，以救灾祛病。中国古代的“巫”还与“祝”相通，“巫”“祝”连用是谓“巫”的祭祀化。他还认为，就古代中国中原先进文化来看，中国固有的“巫”的活动已经笼罩于神灵信仰，而且在泛灵论的同时已经发展出较高级的神灵观念。^③这就是人们多把宇宙间的事物看作是由神来统治的，《国语·楚语下》有着详尽的记载。^④《左传》中也有“所谓道，忠于民而信

① 张涅《老子“道”的依附性与原始巫术思维》，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③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二、三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 《国语·楚语下》有：“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转下页）’”